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吴宓先生像

吴宓、吴须曼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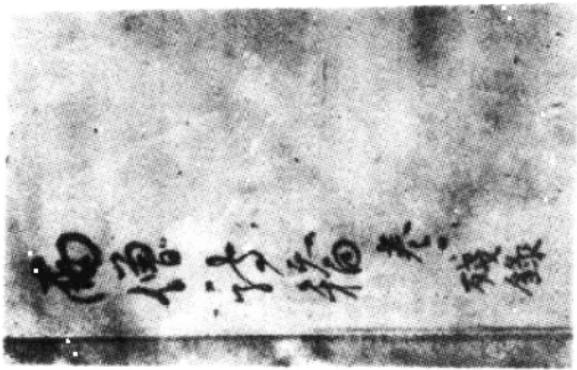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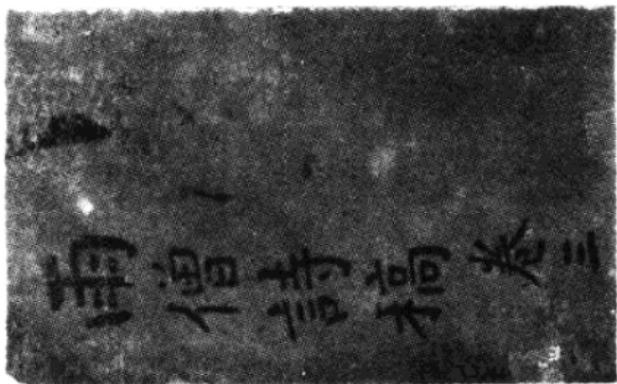
答真告重透曉如闇見懷

排雲殿外一千年。坐世局。誰桑又幾更。寂寂寒山閑。誰
亂。對。碧水送陰晴。君連羽騎獨平野。我逐鶴。狂
人集。城。咫。人天涯。相望。寂。芳時幽怨。愴。離情。

寄示仲麟

目盲尚異彌。兒頓。腸熱終博陸。放翁。雲雨波瀾翻。酒
子。杯弓疑似有。無中燃犀燭。照觀時變。入夢情深。
詒曲衷。立志地為天下士。何緣觸事計窮通。

吳宓手迹



贈淑惜

奇才湘蜀未張旛。握手猶思緣會殊。拊牀而談至
景晚。安享東山賞長沙。勞歌笑我成無補。志業違君
願。益友之音嘵嘵流落處。不為羨猶便忘愁。

贈淑惜

君上遠車一夕歸。君王正使謫歸幽。君平子。嗚欷
處。惟下三拜。惄仲抒慧質。仍成績學美。高才美
慮。世情昧。微莊心。竟明形色。生。師承恩。啟予。

吳宓手迹

日記
未完

田紀(1969)

三日	Mon. 在四合院 4205 红墙外东侧过街天桥下。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四日	Tues. 在四合院 4205 红墙外东侧过街天桥下。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五日	Wed. 上下午，均在 4205 红墙外东侧过街天桥下。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六日	Thurs. 4月30日起，午前午後，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七日	Fri. 5月1日起，午前午後，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八日	Saturday. 5月2日起，午前午後，均施白漆，分二组，坐于不動。

七
游

目 录

- 历史不会忘记他 马富明(1)
回忆先兄吳宓教授 吳須曼(5)
豪华洗尽见真淳 王树仁(14)
吳宓诗抄 (22)
吳宓日记摘抄 (27)
说时间 吳 宓(35)
冯润章及其创建的仲麓中学 马富明(38)
于右任先生童年轶事 房建琪(43)
于右任先生过永乐 刘羽升(49)
革命第一课 刘铁涯(52)
安吳青训班生活诗抄 刘铁涯(67)
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
 开得有声有色 王维亮(70)
文连清廉 洁生俊杰
 ——记抗日勇士孙洁生将军 孙文艺(73)
民国十八年年馑 王兴林(81)
名中医焦芾南 牛锡羣(89)

“疯子老一”的恶迹和 被杀经过	牛志诚(92)
郭子仪单骑见回纥	王兴林搜集整理(100)
泾阳县历史沿革	徐志祯(103)
泾阳县人口简史	屈松泉(111)
泾阳八景	第伍旭搜集整理(114)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是我国著名学者吴宓教授逝世十周年祭日，本刊特发表一组文章和两帧照片，此外还选录了吴宓先生的有关遗作和遗墨，以志纪念。

——编者

历史不会忘记他

——吴宓教授最后的日子

马富明

毕生倾注心血于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事业的著名学者、教授吴宓，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待遇。一九七六年当吴宓先生病重时，又被迫退休，由亲属将其从西南师范学院接回原籍泾阳居住。从此，吴宓先生便在其胞妹、泾阳面粉厂职工吴须曼的照料下，在泾阳西关一家简陋的民宅里留住下来。由于多年的恶劣环境和未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吴宓先生业已双目失明。吴宓先生先在“文革”的一次批斗

马富明，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泾阳文史资料》副主编，
此文原载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人民政协报》。

中摔坏了右腿，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现在又失掉了双眼，不能读书，使其晚年生活更蒙上了一层惨凄的阴影。

吴宓先生自住居泾阳后，仿佛已被历史遗忘似的，没有人再提到他，只在吴须曼同志的关怀照顾下，默默无闻地走向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一九七七年泾阳文化馆两位干部闻讯后，前去造访，但此时先生已杜门谢客，不冀相见了。

吴宓先生，字雨僧，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泾阳县安吴堡，早期留学美国，于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获得硕士学位。他曾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写出了具有独特见解的论文，是我国研究比较文学和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人物之一。他还留学英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翻译了拜伦等人的诗。他出版的《吴宓诗集》约有二十多万字，另外还有两千多首诗作没有公开发表。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创建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先生在任职清华国学院时，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几位著名学者为教授，为

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中外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如呂淑湘、王力、李健吾、张骏祥、曹禺、王佐良、许国璋等。抗日战争期间，吳宓先生又在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培养了大批的外国语言文学人才。他们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外语和中文师资的骨干力量。此外，吳宓先生还先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主编过《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等。解放后，先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和外语系执教，是西师的院务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委员。

吳宓先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文化教育建设。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大量中外书籍，捐献给西师图书馆，供广大师生阅读。

吳宓先生勤奋好学，知识渊博，通晓世界多种语文，可谓学贯中西，文博古今；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工作认真，襟怀坦白。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年月，尚念念不忘祖国年青一代的文化学习。一次他与吳须曼同志闲谈中，听到现在许多

中学都未开外语课，便问其什么原因。当回答他“没有外语教师”时，先生竟急切而不解地问道：“那他们为何不来找我啊？”回答这一意外的疑问的，是一声苦涩的叹息和两行不止的热泪。

吴宓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泾阳含冤逝世，终年八十四岁。先生于弥留之际，尚不时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令人再次联想到先生在那疯狂的岁月中所受到的残酷折磨。

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对国家卓有贡献的老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月，西南师范学院在中文系为吴宓先生举行了追悼会。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工大会，为吴宓先生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的文化名人，发扬其崇高精神，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第三辑《泾阳文史资料》中，将以大量篇幅介绍吴宓先生的生平事迹。并计划在此基础上，广泛征集有关史料，为出刊《吴宓专辑》做好准备工作。

回忆先兄吴宓教授

吴须曼

我的家在陕西省泾阳县嵯峨山下的安吳堡。族中人很多，分东、西、南、北、中五院，我家属安吳之西院，父讳建常，民初任凉州副都统，后任靖国军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博学，有文才。我们兄弟姊妹共计六人，吳宓是我的大哥，他原名陀曼，字雨僧，一八九五年生，幼时读于三原宏道学堂，一九一三年入清华深造，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一九二一年学成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继之东北大学，一九二五年至清华，凡十载。其间，一九三〇年游学欧洲，他曾取道苏联，遍历英、法、德、意、比、瑞诸国，而于牛津大学修学年余。抗战开始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和燕京大学等。解放后，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

先兄一生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竭诚爱

吴须曼：退休干部，现任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

国，奉献无私，对事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十年浩劫之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于一九七八年含冤死去。追忆往事，如在昨日。兹略述三、四，以志纪念。

一九二六年，西安解围，我们全家随父亲由兰州来西安，租住在大车家巷四十号，当时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父亲任秘书长之职。一九二七年一月，大哥由京来陕西省亲，那时，我年仅八岁，兄妹第一次见面，他对长辈的尊敬和恭谨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虽已是著名教授，但在和父亲叙话时，好象一个小学生听老师训讲，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父亲再三促其坐下谈话时，第三次才落坐，且不偏不倚，正襟危坐，神态温和安祥，毫无学者的架子，这正反映了他一生谦逊好学、虚怀若谷的品质。先兄秉性刚直，一九四四年去宝鸡访友，买的是三等车票，上车后没有座位，只好站在走道上，我丈夫王俊生因在铁路职工学校教书，持免费乘车证去送他，便把他带到二等车厢内的空位坐下，待到查票时，查票员说：“这

是三等票，不能乘二等厢”。王即出示证件并向查票员说明，得其认可。但当查票员走后，他很生气的说：“我们是三等票，为什么要坐二等车！”愤然返回三等车厢，站在那里乘车。先兄年轻时，中国正处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崇洋媚外的奴化教育十分反感。国外学习功成之后，立即回到祖国，致力祖国教育事业。大陆解放前夕，先后有国外数家名牌大学延聘他去任教，他都毅然回绝。他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就要根植于祖国的土地。”遂留职国内，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先兄早年即研究《红楼梦》，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为中国学生作过《红楼梦》演讲，一九四七年来西安时，在西北大学作过一次《红楼梦》讲演，听讲的人很多，我当时也去了，偌大的一个礼堂，坐无虚席，每一个窗台都被人占用了，演讲开始后，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当时我感到不是在听演讲，而是在看一个演员作表演，而且是一个人扮几个角色，王熙凤的阴险毒辣，林黛玉的多情善感……都演的惟妙惟肖。他的精采

演讲，轰动了整个古城。此后，先兄还于一九六一年到陕西师大作过一次讲学。

在十年动乱中，先兄历尽苦难，以“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多次批斗。七二年由重庆送往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时因走的慢了，被架他的人推倒，当即致成右腿骨折，才允许回到学院治伤。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请一个保姆，而他当时只有三十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之间，人各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我只好在生活中节约，每月补助他二十元。残酷的迫害和摧残，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兄妹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兰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我回到泾阳后，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寄往学院。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师院，他腿有